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

—兼述中国人心目中的屈原形象—

[中国]浙江大学 崔 富章*

[日本]秋田大学 石川三佐男**

本研究成果是在得到秋田大学 2002 年度教育改善推进费的基础之上,以日本亚洲文化研究为主题所进行的合作研究成果.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在调查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化中心西村时彦所收藏的“楚辞百种”,以及在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所举行的学术演讲这二者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

[内容提要]本文包括三段内容:一,民俗节日裡的屈原故事.二,士人心目中的屈原形象:(1)爱国情操;(2)社会理想;(3)行为方式;(4)生命如歌.三,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1)采集收藏《楚辞》类典籍一百余种,善本在二十部以上,其数量和质量,罕有与之匹敌者;(2)批校,考证,研究,专著有四种:《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其考证的精密和规模的宏大,为世人所称道.

关键词:西村时彦 楚辞学 楚辞 屈原 端午节 楚辞王注考异 楚辞纂说 屈原赋说 楚辞集释 怀德堂中心 楚辞百种

民俗节日里的屈原故事

中国农历五月初五日(西元六月上,中旬间),是传统的民间节日—端午节.每到这一天,全国的老百姓都会不约而同的进食“糉子”,一种用箬竹的叶子包裹糯米而煮熟的食品,或自家制作,或市场采买,或邻里亲朋馈送,到处可见拎着糉子的人,成为节日里的一道风景.其实,我的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所在的杭州市,浙江省,乃至长江南北的广大地域,糉子乃常见之物,四季皆有,只是端午这天特别多一些;但是在中国北方,我的家乡山东省周村,糉子却不常有,在我的童年时代,似乎只有端午节这天才能吃到这种美食,白白的黏黏的糯米,伴着箬叶的清香,和着仲夏的勃勃生机,至今回忆起来,为之神往.不过老人告诉我,这糉子本是给屈原吃的,爱祖国爱人民的大诗人屈原,就在五月初五这一天,一纳头跳进汨罗江,乡民前去拯救,一连数日,不见踪影,乃以竹

筒贮米,投水祭之,後来便改用糉子了.老人们还说,屈原投江之後,乡民纷纷划着龙舟(独木舟)赶来拯救,水手们着急,争先恐後,划得飞快,至今在江南水乡,端午节这天还要举行龙舟竞渡,追念屈原.这许多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犹如一粒粒种子,植根在我幼年的心灵里,直到读大学以後,我陆续从文献典籍中找到许多有关的记载:

1, [晋]葛洪(283—363)《抱朴子》:屈原投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口渡,或谓之飞凫,亦(有脱文)日,州将士庶,悉临观之.(《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七)

2, [前秦 350—394]王嘉《拾遗记》卷十: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秦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和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用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

3, [刘宋 420—479]东阳无疑《齐谐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筒贮米祭.今市俗置米于新竹筒中蒸食之,谓之装筒.其遗事,亦曰筒糉.(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本)

2003年1月22日受理

†Contribution concerning Chuci (楚辞) Study of Tokihiko Nishimura

*崔 富章, 浙江大学(中国)

**石川三佐男, 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

4, [梁 502—557]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之水,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綵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糉,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清光绪六年三徐堂刊《增订汉魏丛书》本)

5, [梁]宗懔(?—561)《荆楚岁时记》:“是日竞渡采杂药。”隋(581—618)杜公瞻注:“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第22页)

6, [隋 581—618]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五引[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方伯协,极烹鹜,用角黍,龟鳞顺德。以菰叶裹黏米,杂以粟,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注云:……一名糉,一名角黍。”(富章按:此乃传世文献中“糉子”名称的最早记载)又引(梁)吴均《续齐谐记》一段,附记:“吴歌云:五月节,菰生四五尺,缚作九子糉,计止南方之事,遂复远流北土,又有为日月星原鸟兽之状者。”又记云:“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原投汨罗之日,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在北,舸舫既少,罕有此事。”(《古逸丛书》本卷五)

7,《隋书·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櫂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櫂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

8, [唐]刘禹锡(772—842)《竞渡曲》: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綵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武陵竞渡略》:竞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今洞庭以北,武陵为沅;以南,长沙为湘也。故划船之盛甲海内,盖犹有周楚之遗焉。……龙船抵暮散船,则必唱曰:“有也回,无也回,莫待江边冷风吹。”其来甚远,……

乃数千年之语也。(《湖南通志》)

9, [宋]欧阳修(1007—1072)《端午帖子》诗云:楚国因谗逐屈原,终身无复入君门。愿因角黍询遗俗,可鉴前王惑巧言。

10,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引《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於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糉,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糉,言免蛟龙之患也。(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11[明]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穀部四》:糉,俗作粽。古人以菰芦叶裹黏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用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也。

12, [清 1644—1911]顾禄《清嘉禄》:五月竞渡,相传吊三闾大夫而作,本《荆楚岁时记》之说,但于吴地无涉。赵晔《吴越春秋》以为起于勾践,盖怜子胥之忠而作。周栎园《因树屋书影》以为(越国)习水报吴,托于嬉戏。……然则荆楚自为灵均(屈原),吴越自为(伍)子胥耳。

从父老口头传说,到文人的选择记录,屈原故事确实已经融入端午节日习俗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端午习俗中还有数项标志性内容,如:①家家户户挂艾叶,插菖蒲,有民谣云:“荒坡艾叶喷喷香,溪边菖蒲伴石长。青烟剑叶能驱疫,岁岁端午站门岗。”艾叶,菖蒲含芳香性树脂和挥发油,均可入药,有辟邪(瘴气,害虫之类)禳灾(疫病)之功效。②饮雄黄酒。端午时节,人们用白酒掺以蒲根,雄黄配制成雄黄酒,“喝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小孩则涂在头,面额部或晨起洒在床下,墙角,以辟毒虫。这些以避害禳灾为旨归的节日,恐怕很难跟屈原事迹发生内在联系。就是端午糉子,亦有祭屈原和饲蛟龙两说,划龙舟则更有纪念伍子胥,屈原等数种说法。其实,糉子起源很早,划龙舟“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闻一多《端午考》,开明书店1948年《闻一多全集》第238页)。传说屈原投江时,汨罗一带的百姓正划着龙舟祭龙,屈原投江後,乡亲们便划着龙舟赶来救人,由此演变为龙舟竞渡(毛庆《诗祖涅槃》,三联书店1996年4月排印本,第185页)。无论是吃糉子还是划龙舟,都可以上溯到四,五千年以前的原始部落时代。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後,屈原故事始融入端午习俗之中。在屈原之前,融入端午节日之中的人物,在北方有介子推,在南方吴越地区有伍子

胥，还有苍梧的陈临等，最后是屈原大夫获得了普遍接受，到东晋南朝时期，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目的主角。这是端午习俗发展演化史上的大事件。屈原故事为端午节注入了新的血液，新的生命力，逐渐发展为除春节之外的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到这一天，全国上下，东西南北，家家户户，人人参与，挂艾叶，插菖蒲，吃粽子，赛龙舟，气氛热烈浓郁。特别是在秭归，屈原的家乡，每年都在屈原沱举行龙舟竞渡，长江南北两岸，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江面龙舟飞渡，岸边观者如云，奋力划舟的桡手，吊唁三闾大夫的《招魂曲》，激浪荡波，响彻云天。1987年四川乐山主办全国“屈原杯”龙舟赛，参赛龙舟134只，渔舟56只，造型龙舟21只，彩船67只，观众达100万人。一年一度的香港国际龙舟赛规模更大，迄今已举行了二十七届，正在划向世界。日本也有端午节这一传统的行事。这一天，作为屈原的忌日，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明治，大正，昭和时代，各地的家家户户形成了装饰菖蒲，彩绘肥鲤的风俗。有的包粽子，投到江河里，特别是“龙舟竞渡”（即赛龙舟）的行事，盛况可观。这些民俗活动可理解为对屈原的祭祀以慰藉其灵魂。在日本当下的琵琶湖等地，每年举行“屈原杯”和“铭打”（在物品上刻名字）的“龙舟竞渡”活动。屈原的家乡秭归，更以善于建造各类竞赛龙舟，游览式仿古彩龙舟，画廊式钢制彩龙舟，获得国家专利，闻名全国。

中国是诗的国度，文学家的摇篮。先秦的屈原，汉代的司马迁，东晋的陶渊明，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东坡，元代的关汉卿，清代的曹雪芹等等，都以其不朽的成就赢得了后人的纪念和瞻仰，堪称为伟大的作家。他们之中，唯有屈原，得以融入民俗节日之中，享受岁时祭祀。这份殊荣，虽不无机缘之因素，但比较下来，似乎也非屈原莫属。

士人向往的屈原形象

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40年前后，逝世于公元前278年前后，这是郭沫若先生根据《离骚》里的两句诗“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木星正月里晨见东方的那个年头，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又参考相关文献旁证而推测出来的，大致不错。这个时段，恰恰是楚国由盛转衰，迅速走向衰落的年代。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屈原走完了自己悲壮的一生。他的生命历程，大致有三个阶段：①读书求学；②从政为官；③放逐流浪。屈原的远祖是国王的儿子，所以司马迁为屈原作传，开头就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

也。”可以断言，他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重视品行的砥砺。他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叫“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王逸《离骚经序》）也就是说，三闾大夫的职责是管理王族三姓，还要教育王族子弟，把他们培养成“国士”。“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离骚》里的这四句诗，正是用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贤才，是诗人早年教育生涯的艺术再现。他曾经得到楚怀王的赏识，一度担任“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本传）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几乎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的政绩，能考知的有两大件：一是强化与齐国的联盟，以抗衡秦国。这是为了楚国的国家利益，而作出的政治选择。为此，屈原三次出使齐国，每次往返数千公里，坐着马车，风尘仆仆，可惜楚怀王不能充分了解齐楚联盟的重要性；二是接受国王委托，“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完成并付诸施行的法令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从“每一令出，平伐其功”的传言（或谣言）来判断，则肯定是有的，还不只一，两件。跟屈原同朝为官或稍晚的左尹（主管司法）邵，他的墓（包山2号墓）中出土许多司法文书档案（竹简），其中有一桩诉讼案件，传唤证人竟达211名。“舍庆杀人”一案，县正判定之后，舍庆不服，县以此案上报左尹，左尹不能判，便报告楚王，楚王的命令则由左尹向县正传达。由此可见，当时的楚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水平，都已经相当可观。这件事也可以证明，屈原“造为宪令”，功不可没。法治的结果必定是限制旧贵族的特权，所以上官大夫一伙采用阴谋手段，再加上秦国派张仪做间谍，又碰上“不知忠臣之分”的楚怀王，屈原被疏远了，逐渐远离了权力中心，直至放逐江南草野之中，陷入长期的矛盾和痛苦境地。欲罢不忍，欲干不能；欲远走高飞，复“蜷局顾而不行”，弃置而复依恋，无可忍而又不忍；欲去还留，难留而亦不易去。郁结蹇产，念念不忘，重言增歎，危涕坠心。“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奋斗者，先觉者的孤独感，危机感，正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的基调，主旋律，也是传统的中国文人，中国士大夫，尤其是失意的士大夫无不击节叹赏的魅力之所在。寄托也罢，共鸣也罢，旷百世而相

感，“哀怨起骚人”。

现在我们来分析，士人心中所向往的屈原形象，即屈原精神的内涵。

（一）爱国情怀。

屈原具有一幅爱国热肠，依恋故土，热爱他所赖以生长的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和文化。早年，他写《橘颂》以明志：“独立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被谗疏绌，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倾诉自己的忧虑和失望，在幻想中驭龙飞天，去国远游，“指西海以为期”。可是，却半途而废，“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等到升起来的太阳照得四处光亮，我忽然看见了故乡，仆人生悲马儿怀想，低着头回顾而不肯前行。）被疏放汉北之后，在《抽思》诗中他把自己比喻为一只美丽的鸟：“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娉佳丽兮，·独处此异域。……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郢都的路途确是遥远，梦魂一夜要走九遍。我不管是弯路还是捷径，只靠着月亮和星星的指引飞奔向南。译诗多采自郭沫若先生和姜亮夫老师的译作，以下不再一一出注。）流放江南以后，他在《哀郢》中写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啊，我在向四方远望，要几时才能再回故乡？我无罪而遭受流窜，日日夜夜心中不忘！）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故国情节，正是诗人爱国情怀的真切表达。

（二）社会理想。

中国文学史上最长的美轮美奂的抒情诗《离骚》，有学者目之为“心灵的自传”，最后两句是：“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美政”就是屈原向往的理想政治，社会理想，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美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后世研究者依据屈原的作品以及有限的史迹，推测出一条又一条，不胜枚举。依我看，屈原“美政”理想最核心最根本的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写在《离骚》中的这两句诗，几乎把“美政”理想和盘托出了。举用道德高尚，品行端正，才能优异的人（德才兼备），让他们在职在位，遵循着法度规矩，毫不偏颇地管理国家事务（有法必依）。不用“贤能”之人，没有“绳墨”之法，所有治国安邦，惠及民生的设想都将落空。屈原任职三闾大夫，“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整饬，操练成国家的栋梁之才）。“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乎吾将刈。虽萎绝

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我已经种下了九顷地的春兰，我又曾栽就了百亩园的秋蕙。我曾把留夷和揭车种了一陇又一陇，还植有杜蘅与芳芷。希望它们的枝叶茂盛起来，等到了花时我便要加以收割。我自己萎谢了也不算什么，我伤心的是一群芳草竟遭人践踏。）屈原曾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尤其注重品格的美善。他一定参与过人才的推荐和选拔。“说操筑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传说是在傅岩版筑的佣奴，武丁举用他为相毫不犹豫。吕望是朝歌的屠户，遇着周文王便拜他做了师傅。甯戚在喂牛时扣角而商歌，齐桓公听到了便聘他做了大夫。）有学者认为，这些举用贤才而使国家兴旺发达的历史故事，本是屈原说给楚怀王听过的，目的是启发他认识“举贤授能”是何等重要。在《惜往日》中，这层意思更为明显：“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於庖厨。吕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我听说百里奚做过俘虏，伊尹做过厨夫，吕望在朝歌做屠夫，甯戚唱着歌餵老牛。倘若他们不是逢着商汤，周武，齐桓，秦繆，人世间又有谁知道他们的益处？）看来，屈原举荐人才不太顺畅，更要命的是他还担负着“监察群下”之重担（王逸《离骚序》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这可是个得罪人的差使。试想，碰上屈原这般清纯，忠实的监察官，那些谋私的人，有几个能够漏网？“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慢兮，椒又欲充夫佩帙。既干进而务人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我以为兰本来是万分的可靠，谁知它名实不副，抛弃了自己的美质随俗取容，它真真是辱没了一般的香草！椒，他专一的取媚而妄自夸大，本来是茱萸也妄想充实香包。既已经不自珍重而力求佞幸，纵使还有点香又有什么可宝。时俗所喜欢的是随波逐流，谁又能保持得不生出变化？看到椒和兰都变成了这般，揭车和江离更无须乎多话。）屈原触犯了这样一个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谋私兼谋公，目光短浅的利益集团，群起而攻之，“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心为公，反对结党营私的屈原当然没有自卫能力，众口铍金，他的地位就汲汲可危了。其实，屈原从开始就知道仅仅“举贤授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制定如同工匠手里的“绳墨”那样的法律，他也确实曾经受命“造为宪令”，他工作得很投入，直到很多年以后，

放逐流浪途中，还深情地回忆那段美好的日子：“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回想从前我曾经受信用，禀受王命使时代昭明。把先代成功的经验昭示众庶，使法度严密无疑可存。国家富强而纲纪缔定，政在贤者而天下太平。只须对机密事经过操心，只有无心过失，不受处分。）他比喻道，乘快马奔跑而没有辔衔，汨汨下流而没有舟楫，“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那是多么的危险啊！可是，举贤授能无异于缩减特权阶层的官位，法度严密则意味着限制特权阶层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疯狂反对。纯洁的诗人不懂得现实政治的复杂，既不知道防范别人，也没想过自我保护，堂堂朝廷之上公然发生了上官大夫“夺稿”这样的野性事件，屈原遭到暗算，楚怀王迅速改变了态度，“怒而疏屈平”，诗人以失败告终。他反思道：“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专唯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仇。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惜诵》）不过，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屈原的“美政”理想是不朽的。现代中国，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然是全社会政治生活，政治文明的中心议题，全国上下追求的目标。就是在发达国家，也同样是公众关注的重要议题。可以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屈原的美政理想，乃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的主题。“这是一个多么光辉的思想。屈原早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竟是今天大家所追求的。屈原实在太伟大了！”（蓝海明《今本楚辞·前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诗人如是说。古今一理，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永远与人民心心相印。

（三）行为方式。

屈原追求完美。他执著于“美政”理想，毕生奋斗，视死如归；他嫉恶如仇，口诛笔伐，不留余地；他出污泥而不染，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为民生的艰难而“掩涕”，为祖国的灾难而痛哭；他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忧，“魂一夕而九逝”。这些都为後人所称道。屈原的行为方式，更具个性的，是敢于批评国王，骂楚怀王是个“壅君”。如前所述，屈原的社会理想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在专制社会里，举贤授能以及制定，实施“绳墨”之法，都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君王圣明。君王是不能选择的，圣明与否也是难以预知的。像楚怀王这样的，圣明难说，但也不能说很坏。他起用屈原，出使齐国，以结强党；他力图改革朝政，重用屈原这样的人才，起草宪令，图

议国事；他拒绝秦人割地要挟，客死异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史记·楚世家》）楚怀王大节还可以。但是他犯有致命的错误。首先，他不能充分认识齐楚联盟的重要性，时而联齐，时而联秦，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导致六国同盟瓦解，送给秦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其次，他不知“忠臣之分”，听信谗言，疏远屈原这样的忠贞重臣，结果被上官大夫一派守旧的贵族所包围，导引出连环失误，楚国的国势一再削弱下去，他本人则被秦王玩弄于股掌之上，成了囚犯，死在秦国，为天下笑。屈原的一生可以说和怀王息息相关。是怀王提拔他，信任他，让他参与国政；屈原也忠心耿耿，努力报效国家与君王。唯其如此，他一再向怀王提出批评：“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你一向不喜欢壮健，不扬弃龌龊，何以直到现在这个老毛病仍不改？）”“荃[荪]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今上不审察我的全心全意，反听信谗言而大为生气。）“初既与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当初你已经和我约定，後来你翻悔竟改变心肠。我本不难於同你别离，只叹息你的为人啊太没主张。）在《抽思》中，他继续着对怀王的批评：“数惟荃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我屡屡想到荪——楚君的反复怒容呵，伤了我的心呵，是如此的愁苦！）“历兹情以陈词兮，荪详聋而不闻。”（我一件件将实情报告，但君王呵假装聋听不见。）在《惜往日》中，他又批评道：“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薺幽。”“何芳草之早殒兮，微霜降而不戒。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是君上耳不聪眼不明而有所壅蔽，才使谗佞阿谀的小人日益得势！）“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裡，长期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各级官员大多从他们中间选拔），遇上像楚怀王这样的君王（皇帝），该如何应对呢？营私的败类乘机大显身手，固可勿论；愚忠者自是服从，不会置疑的；一心为国建功立业的，志存高远的，志士仁人，则陷入两难的境地。明明是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好事，由于上司（皇帝最大）的昏庸或失误而不得施行，甚至遭受打击，只有扼腕叹息，而不敢批评“今上”，更不敢骂一声“壅君”，心向往之而不敢为。这时候，屈原的形象，屈原大夫的所作所为，就会浮上他们的心头，鲜活起来，神接千载之上，与他交流，与他共鸣，聊舒胸中的愤懑。屈原就这样成了失意士大夫的精神楷模，心中的旗帜！宋人洪

兴祖说得好：“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

（四）生命如歌。

屈原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怀着满腔的热情和理想，投入了诗歌创作之中。他先后写下了《离骚》，《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等美丽的诗篇，还帮助沅湘一带的居民整理改编了美妙灵动的《九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精品，进步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作品，屈原在文学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中国诗人之父，他投汨罗江的日子，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全国各地，大江南北，亿万人民深情地纪念他。中国屈原学会隔年举行一届屈原学术讨论会，弘扬屈原的思想，欣赏屈原的艺术，探讨屈原的人格魅力，在不断的诠释中，把屈原精神发扬光大。而台湾的诗人，作家暨学界朋友们，认这一天为诗人节，或集聚一堂赋诗联咏，或座谈讨论专题演讲，纪念活动，丰富多彩。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有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中国近代的大学者王国维（1877—1927）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屈原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怀有美好的社会理想，曾经投身政治斗争激流之中，对现实生活有真切的体认。他把在政治上的不得意，他对谗人的痛恨，他对国家和君王的忠心，他自己的心志，他的美政理想，全部宣泄在他的诗歌里，字裡行间，人们能够触摸到诗人的脉搏，聆听到社会的呼声，感受到特殊的力度。生命如歌，歌如生命。尼采所谓“血书”，王国维所云“高尚伟大之人格”与“高尚伟大之文学”者，屈原大夫当之无愧。他的爱国情怀，他的社会理想，他的人格魅力，藉着优美的诗篇，熏陶着中华民族的性格；他的坚持正义，至刚至正，不屈不挠，无私无畏，凝成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屈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上，并且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和纪念！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

西村时彦（1865—1924），字子俊，号天囚，晚号硕园，大隅种子岛（日本国鹿儿岛县熊毛郡北种子村）人，文学博士，明治，大正间汉学家。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尝任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东京朝日新闻主

笔。中年以后，性行大变，退出大阪朝日新闻社，致力于《楚辞》，《尚书》等汉学典籍的研究，著述很多，主要有：《日本宋学史》，《尚书异读》，《尚书文义》，《论语集释》（自学而至泰伯八章），《中庸解题稿》，《楚辞集释》，《楚辞纂说》，《屈原赋说》，《楚辞王注考异》，《杭州纪行》，《金陵胜概》等。

西村时彦曾两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1898年冬天，翌年回国；第二次是1899年冬天，这次他在中国居留二年余，直到1902年春天才返回日本。他至少在中国度过了两个端午节，弥漫在大街小巷的浓浓的节日气象，人文氛围，中国人心头的屈原情结，特立独行的屈原形象，可能使他受到深深的感染。他开始购置《楚辞》类典籍，在上海买到清同治八年金陵书局翻刻汲古阁本《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这部书一直陪伴他到弥留之际。西村在中国前后近三年时间，他游历过很多地方，在西湖之畔，孤山之阳，他拜访了主持诂经精舍讲席的俞曲园（樾）先生，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特为西村时彦的书室题写“读骚廬”匾额，可以想见，西村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气氛相当融洽。他的《杭州纪行》，《金陵胜概》等著述中，一定有更翔实的记载，我们期盼它们早日公世。

西村时彦的“读骚廬”中收藏着一百馀部《楚辞》类典籍，就规模而言，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就质量而言，则更是可观。

（1）西村购置收藏中国明代（1638—1644）刊本达十六部之多，这在中国的国家书目中皆列入“善本”类图书。其中，明正德十三年（1518）吴郡黄省曾校，王鏊序，高第主持刊刻的《楚辞章句》十七卷，是王逸《章句》迄今传世的最早的本子；万历十四年（1586）的俞初校刊本，杭州冯绍祖观妙斋刻本，都具有很高的版本校勘价值。

（2）西村收藏清代（1644—1911）刻印本四十余种，其中有列入中国国家书目“善本”类十四种。《楚辞评注》十卷（王荫著），西村收藏的是清康熙十六年（1677）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是清乾隆（1736—1795）刻本；嘉庆六年（1801）大小雅堂重刊隆庆五年（1571）夫容馆本《楚辞章句》十七卷，汲古阁毛表校吴郡宝翰楼重刊本《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在中国已极为罕见；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刊本《楚辞心解》四卷（江中时著），姜亮夫老师《楚辞书目五种》著录书名，著者，版本，未作提要和本叙录，亦未著录藏家，大概没有见过全本。

（3）西村藏有钞本二十七种，其中不乏稀见本。钞本《王注楚辞翼》三卷（题北越董鸥洲著），饶宗颐

先生《楚辞书录》著录作“楚辞翼，清北越董鸥州撰，日本西村硕园藏手稿本”；姜亮夫老师《楚辞书目五种》著录“见饶氏引日本西村时彦辑本”；据此判断，西村时彦藏本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唯一传本。《屈子说志》七卷（清陈远新著，据乾隆十四年序刊本钞）。饶宗颐先生《楚辞书录》著录“乾隆十四年刊本 日本西村硕园有钞本三册”；姜亮夫老师《楚辞书目五种》谓“此书极少见。余得一残本，起卷四《卜居》以下各卷，则前三卷为《离骚》，《九歌》，《天问》可知。”此书除北京图书馆藏乾隆十四年原刊本外，此钞本则是传世的第二个全本。

(4) 民国时期的刻本，影本，印本计十五种，其中亦不乏稀见本。我印象最深的是《读骚论世》二卷（曹耀湘著），此乃近代湖湘学派“知人论世”的代表性作品，民国四年（1915）由湖南官书报局排印出版，年代并不遥远，可是在中国寻找此书，久觅不得，两年前由石川教授寄赠西村藏书之影本，书眉还有西村时彦先生的批校，当时我的感觉真是“如获至宝”。

(5) 西村藏有日本刻印本《楚辞》类典籍十二种，对中国学者而言，这些都极为罕见。例如，宽延二年十一月（1749）皇都书林刊印《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卷端题“楚辞卷第一 离骚经章句第一 校书郎臣王逸上 曲阿洪兴祖补注”），由皇都书肆中村治郎兵卫，上柳治兵卫等八人合作刊版，上柳治兵卫即京师儒者上柳四（一作“士”）明（俗称“治兵卫”），学名柳美启（1710—1790.7），是本书的校勘责任人，卷末有他写的《跋》云：“楚辞十七卷，朱子全注，梓行有年，流布极广。独若王逸古注，则资诸华版，而稍稍散乏，既垂泯灭。往自伊洛馀波，浸淫海东，而吾邦缝掖，专以程朱为准的，不肯些转其视，当时书肆，亦惟一切阿顺，以射贾利，遂致此忽略尔。近十许年，风习稍迁，学者易方，古书镂版，往往而出，而犹不及此者，独何哉？逸注善本，固未易得，若其具洪兴祖之补，则绝无之也。……予购求数年，今而始获，乃阅之，则汲古毛奏叔所校，最为整饬可传。然但兴祖序题，宜存而不存，且补注间有数字脱而不补，因知此希世残编，虽彼大方，而仅仅一种，无复别本可校也，况吾异邦，而获之为幸，焉暇指其微瑕乎！因即翻刻，以弘其传。览者察诸，平安柳美启识。”柳美启购求所获“汲古毛奏叔所校”本，即清康熙元年（1662）毛氏汲古阁刻本（毛表，字奏叔，毛晋之子）。

但是，日本翻刻时於扉页题“楚辞笺注”，首册封面题“楚辞注”，册二至册八封面题“楚辞笺注”，

竹治贞夫先生据此作出判断：“我认为它是以宝翰楼本为底本的。”（《楚辞研究》第五章《楚辞的日本刻本及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1978年风见书房印行）这一判断是错误的，让我们举证以明之：

(a)《渔父》“世人皆浊，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世人皆浊”下，汲古阁本无注，但留有长条空白（约六个大字空间），宝翰楼本有注“人贪婪也。一作举世皆浊。史记之[云]：举世混浊。”柳美启本无注，留有长条空白，与汲古版相同，西村时彦藏本手书填充“人贪婪也。一作举世皆浊。史记曰举世混浊。”眉间批校：“隆庆本无注。今据金陵本补入。汲古本同。‘人贪婪也’，冯本作‘众贪鄙也’。”按：《渔父》此句之上有“举世皆浊我独清”，王逸注：“众贪鄙也。”洪兴祖考异：“一作世人皆浊。史记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有此王逸注，洪兴祖考异，则在其後的“世人皆浊”可不注，亦无须再作考异，汲古阁本的处理是正确的，之所以留下空白，或底本有注，考异（宋代书坊误增），或别本有之（如明嘉靖间翻刻宋本《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民国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辑入《四部丛刊》中），故汲古阁刊版者留此标识以待问也。吴郡宝翰楼书坊主人陈枚（经营书业四十年之久，还同时设有“武林文治堂”，“金陵孝友堂”等，他是《楚辞灯》作者林云铭之至友）遂增刻王注洪校，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翻刻本又因袭之，可谓无识之举。

(b)《渔父》“众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醪？”汲古阁本洪兴祖补曰：“餽，布乎切。”宝翰楼本误“切”为“初”。柳美启本不误，同汲古阁本。

(c)《九辩》“然·晷而莫达”，洪兴祖考异：“露，一作雾。”明翻宋本，汲古阁本，宝翰楼本，金陵书局本并将洪氏考异中的“露”误作“露”，唯宽延二年（乾隆十四年）柳美启本改正为“露”。根据上下文意，可判断出明显的错字，只要校刊者心细，是可以径改的。

前两项例证足以说明，柳本径直出自汲古阁本，而不是以宝翰楼本为底本的，仅仅是封面和扉页误题“楚辞笺注”之名，又误增王世贞序——此序乃王世贞应明宁献王朱权七世孙朱多·（字用晦）之要求，为隆庆五年（1571）夫容馆（在南昌）仿宋刊《楚辞章句》十七卷而作，宝翰楼本亦无。西村时彦藏柳本有批校云：“汲古阁本不宜有隆庆重雕宋本王序，今冠之卷首者，坊贾所为也。”五十餘年之後，竹治贞夫先生在《楚辞研究》中提出“甚是不当”之批评，又称“作为明本以及汲古阁本祖本的宋本，其洪氏自

序与考异一卷也都已失掉了。大概就缘于此，本书的刊行者为了保持书籍体裁的完整，才借用王世贞序文来刊出的吧。”其实，有西村时彦的批校在前，竹治贞夫的再批评及其测度，便可以省略了。

在《楚辞章句补注》传世各本中，汲古阁本为最优善本，柳本既源出此本，又订正若干错误，且正文与注（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都加句点，复益之以西村批校，如《离骚》“岂余心之可惩”，眉间校语：“岂，一本作非。”《九歌·国殇》“首身离兮心不惩”，眉端批校：“一本身作虽，是也。”《离骚》“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王逸注：“言士民所以变直为曲者，以上不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眉端校云：“一本善志作善士。按文选作善士，非也。”前两条校语的底本是明隆庆五年夫容馆仿宋刊本《楚辞章句》十七卷（正德十三年吴郡黄省曾，高第刊本同），第三条校语的底本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尤袤校刊《文选》李善注本，渊源有自，按断尤见功力。竹治贞夫未尝言及，故特为拈出，表彰西村藏本之文献价值。

再如宽延三年五月（1750）庄允益（字子谦）校刊《楚辞章句》十七卷，首王世贞序，次庄允益（字子谦，姓庄田，一作村田，名允益，通称平五郎）序，次服元乔（即服部南郭）题楚辞王注校本，次凡例六则，次目录，次“楚辞卷之一 汉刘向编辑，王逸章句”，次王逸离骚经章句小叙，次入正文，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三字（注小字双行），本文与注都加句点。卷尾有刊记：“宽延三年庚午五月 江都书肆前川六左卫门发行”。王逸《楚辞章句》十六卷（卷十七《九思》非逸注）撰成于公元120年前后，历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余年，全靠手写流传，当年的写本，除汉简数枚外，可谓荡然无存。两宋是中国刊版印书的黄金时代，《楚辞章句》有多种刊本，亦漫不复存。今日得见之善本，唯明本数种耳，如正德十三年（1518）吴郡黄省曾，高第刊本，隆庆五年（1571）豫章朱多·夫容馆刊本，万历十四年（1586）武林冯绍祖观妙斋刊本等。这些善本，有一共同缺点，即掺入后世传播者附加在《章句》中的文字，如音反，如异文。孙诒让（1848—1908）云：“凡补注本云‘某一作某’，皆洪氏所校旧本，与王注辄淆无别，明刻单注本亦或误采之，并非也。庄本不误。”（光绪二十年刊本《札述》卷十二）刘师培《楚辞考异》谓“明刊而外，唯日本庄益恭较为精善”。（1935年宁武南氏校印《刘申叔先生遗书》本）孙氏所称“庄本”，刘氏之“庄益恭”本，即庄允益

（1696—1754）校刊本。庄氏《凡例》第二则云：“今所讐校，华本四通，此方写本一通，诸本误字，比比出焉。又彼有衍羨，是有不足，交通以成句耳。夫字有古今，楚辞间存古。然前然而后否者，诸本各然。盖眷写任意，从简从俗，故不斉一；即不斉一，亦奚病读。乃不改错，唯谬误可恐也。王注末杪，必有‘也’字，是古注家法，今或无者，即书贾之所削也。其无害於读者，不必补。此方写本，字身体制，盖宋本所传。其及国讳也，缺其点画，乃可以证焉。盖世贞之所序乎？今多从此。”看来，庄氏乃以“此方写本一通”（日本仿宋写本）为底本，校以“华本四通”。然王世贞序乃为明隆庆五年夫容馆校刊本而作，必日本仿宋写本所无，而庄允益刊诸卷首。庄氏或以夫容馆重修本为底本，校刊则采仿宋写本较多，此即《凡例》所谓“今多从此”之意也。庄本确实校改不少讹误，竹治贞夫从《离骚》正文中找出五条，我们还可举出一些例证，如“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軼而并驰”，庄本改“軼”为“軼”；“競周容以为度”，王注：“周，合也。法，度也。”庄本改为“度，法也”，与清人袁廷所见宋本合。庄本最为特别之处，乃是致力於剔除后世传播者附加在王逸《章句》中的内容，志在恢复王逸《章句》之原貌。《凡例》开宗明义：“诸本载音及异同，其出於《释文》，兴祖乎？凡出异同，出其可疑已，今或出其不可疑者，必值误字亦及焉。是书贾之为，而不能择者也。音亦有可疑焉。此本皆不插出，独存王氏之旧。”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未迫”，“弭”字下有“弥尔反”，“崦嵫”下有“上淹下兹音”，“未”下有“一作勿”，庄本将夫容馆本（明刻单注本多类此）中的这些音反，文字异同等，悉数剔除，庄氏认定这都是《楚辞释文》或洪兴祖《楚辞考异》等后世传播文献中的内容。虽然我们不知道庄氏此举之文献依据，但就学理言之，其学术方向是应该肯定的，王逸的时代尚无反切注音（起码是未通行），王逸《章句》是上奏皇帝，宫廷御用，力求要括，连引文出处也一概阙如，更遑论罗列异文。有鉴于此，我在作《楚辞集校集释》时，凡引王逸注，即以庄本为准。西村时彦於庄本眉间批校，名曰“考证”，锦上添花，尤为喜人。可惜我没有及时看到，未及采入《集校》之中，不无遗珠之叹也！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致力于文献典籍的采访和保藏，数量达百种以上，规模可观，质量亦属上乘；二是批校，考证，研究，完成专著多部，主要有：《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等四

种。下面一一著录评述之。

(1)《楚辞王注考异》一卷，大正八年(1919)手稿本，一册。扉页题“屈子学三书之贰 硕园閒事业”。背面方框内书“大正己未八月起藁十二月毕业”，钤“大阪大学收藏图书印”，“昭和 26.9.10 受人阪大 32742 图”印记。首“楚辞王注考异对勘书目”，钤“怀德堂图书记”，“大阪大学图书”，“硕园纪念文库”诸印记。是书以日本宽延三年庄允益校刊《王注楚辞》十七卷为底本，“我邦王逸《楚辞章句》单注本惟有斯书刻版尚存，兹可珍重，而惜误脱亦不尠，因取家藏诸本以考同异，庶几有小补骚学也。”西村所云“家藏诸本”者，计十种：明万历十四年(1586)武林冯绍祖观妙斋刊本，俞初刊本，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燮元，朱一龙吴郡刻本，清光绪十七年辑刻湖北丛书本(三馀草堂本)，汲古阁本，唐写文选残卷(金泽文库旧藏，罗振玉影写复印本)，文选六臣本(通行本)，文选李善注(胡克家重刊宋本)，胡克家文选考异六卷，梁章钜文选旁证。西村叙目云：“以上单注本四种，笺注本一种，文选三种(补二种)，凡八种(十种)，与庄本对校，标异於上栏，今钞写以成一书。”则是书与西村藏庄本《王注楚辞》十七卷所载之“西村时彦考证”，实同一内容也。是书以校异同为主，间及是非。如《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王逸注：“所以象德也[西村考异：汲古阁本，文选各本，无也字]，故行清洁者佩芳”至“孔子无所不佩也”。[西村考异：文选各本无此三十四字]“自约束也。”[西村考异：六臣本，李善本无也字]又，西村另行大字案语：古钞本陆善经引“王逸曰佩者所以象德，故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孔子无所不佩。屈原自以行清贞，故佩芳兰以为兴也。”可知《文选》删节王注[按：西村的意思是，唐写本《文选集注》“纫秋兰以为佩”下先引“王逸曰”，比《章句》本少三十四字(《文选》各本皆同)而接下去陆善经又加引“王逸曰”四十五字，由此可证明《文选》引王逸注时是有所删节的]，而陆氏所引，亦与今本[按：指《章句》本]不同。後人任意窜改，今之所传，非王氏之旧也。再如《离骚》“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西村考异云：“王逸序说曰‘依诗取兴，引类譬喻’云云，‘灵修美人，以媲於君’，然则‘美人’与《诗·邶风·简兮》四章‘西方美人’同是比也，非以服饰美好故称君言美人也。此注与序说矛盾，疑是後人窜入。《文选》不录者，非删节，而唐世犹无此文也。”又如《离骚》“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王

逸注：“再言世溷浊者，怀，襄二世不明，故群下好蔽忠正之士而举邪恶之人也”，西村私案：“王逸以《离骚》为成于怀王之世，而此言怀，襄二世不明，乃似《离骚》成于襄王之世，可谓矛盾矣。”王逸《楚辞章句》各篇序说之间，序说与注文之间，矛盾多多(详参蒋天枢先生《论〈楚辞章句〉》，载《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自屈原殉国至王逸作《章句》，其间历四百馀年，授受之迹不明，必有为其学者师师相传，持守以呵护之，王逸《天问後叙》所谓“世相教传”之言，必有事实为之依据也。即“教传”，必解释文句，申说大义，则笺识序说，代代累积，王逸所见之本，多有遗存，遂沉淀於《章句》之中，是乃矛盾之源头，千馀年间无人识破，西村时彦乃较早发现并设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实属难能可贵。“纫秋兰以为佩”，西村以今本王逸《章句》为准而断定《文选》李善注引“王逸曰”有删节；“恐美人之迟暮”，西村以《文选》李善注为准而断定今本王逸《章句》有後人窜入之文字，“非王氏之旧”，进一步证成庄允益之说。西村既有汉学之根柢，又具宋学之精微，其文献学功夫，几臻出神入化之境。卷端题“楚辞王注考异上卷，大隅西村时彦学”，内容为《离骚》、《九歌》二篇，则《天问》以下各篇为下卷，惟不知佚於何时，飘落何所矣。

(2)《楚辞纂说》四卷，手稿本，四册。扉页钤“大阪大学收藏图书印”，“昭和 26.9.10 受人阪大 32623 图”印记，卷端题“楚辞纂说卷一，西村时彦编”，钤“硕园收藏楚辞百种”，“天囚书室”，“硕园纪念文库”，“怀德堂图书记”，“大阪大学图书”诸印记。是书采录自《史记》以下有关屈原和楚辞的文献资料，举凡历史，地理，民俗，传说，文物，古迹，建设，关于屈原及其创作的文献典籍，论评，屈原精神的传播弘扬，等等，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一百馀种，条目达四百馀款。随手辑录，依文稿厚度，分装四册。第一册内含“卷一”，“卷二”，亦非分类编次。许多条目之末，西村有按语，或辨析源流，或论其价值。如《贾长沙集·吊屈原赋》全文之末，“按屈原之姓字事迹，与其所作之文，先秦古书则不一及。屈子死後见于记载者，以此篇为始。微此篇，则虽自《卜居》，《渔父》理其姓字，而後人或以为假托马《史》亦恐不能徵信也。则贾生诚为屈子知己，而此篇为骚学功臣第一。王逸哀集楚辞，不知何以不收此篇。至宋晁无咎重定楚辞，取以为‘续离骚’，朱子依之，是也。今自《史记》本钞出，以冠于《纂说》，亦不忘祖之意云尔。”再如《汉书·淮南王安传》“初，安

人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之下，引“王念孙曰：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西村“按王念孙所引《东观汉纪》，後汉明帝时创修，灵帝时成书，高诱亦後汉人，并足以为据。然班固《离骚解序》云：‘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王逸《楚辞章句·序》亦云：‘至於考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作《离骚经章句》’；曰传曰章句，虽不相合，而其书则一。班固，王逸去武帝未远，且固曾祖旂与刘向校秘书，父叔皮（彪）修《汉书》，而固成其业。叔师亦为校书郎，其说必有所受。则《汉书》‘离骚传’之‘传’字，恐非‘傅’误。盖淮南王有赋与传，而‘旦受诏日食上’者，居其一也。”又如《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佚文》一条，自《史记》“屈平之作离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辑出，西村论曰：“按楚辞至汉大行者，虽因屈子之忠与其词藻之美，然亦高祖，武帝并乐楚声作楚辞之所致也。武帝命淮南王安为离骚传，是为骚学之祖，其书今亡而不传。班孟坚《序》所引淮南王语与《史记》本传中之文合，宋洪氏补注楚辞卷第一下引之，云‘岂太史公取其语以作传乎？’然则此语虽仅仅壹佰五十五言，亦可以见淮南王，太史公二人尊重屈赋之意，而其所以盛行後世与日月争光者，此语启之也，可尚哉！洪氏所引，不过数句，故予今自本传中钞出，以徵骚学渊源焉。”这些都可谓考辨详确，论述合理，还有些则是发现问题，如《汉书·古今人表》，人分九等，屈原列二等（上中，仁人），引杨慎论《人表》“其谬有四”之後，西村曰：“予以窃怪孟坚《离骚解序》以屈原为‘非明智’，而今此《表》列之於‘仁人’，以错乎‘智人’之上，《人表》不谬，则《序》或依托也。今姑采录于此，而附载梁氏《玉绳》《人表考》於下云。”班固对屈原的评价，前後起伏很大，西村敏锐地提出这一问题，具有启示意义。该书堪称屈原学之资料库，可惜无目录，全书未编页码，不便利用，当补之。

(3)《屈原赋说》二卷，大正九年手稿本，二册。第一册为上卷，首目录：名目，篇数，篇第，篇义，原赋，体制，乱辞，句法，韵例，辞采，风骚，道术，叙目云：“以上十二篇，时彦在京都帝国大学，为学生讲述，遂缀成册。夫屈赋继风雅於前，启辞赋於後，为文学之大宗，不可不必读。而古今注释，亡虑百家，群言纷淆，疑惑学者。愚因著论，略述大旨。刊误补义，待诸他日焉。大正九年五月西村时彦识。”钤“硕园居士”印（阴文），卷端题“屈原赋说卷上 大隅西村时彦学”，钤“怀德堂图书记”，“大阪大学图书”，

“硕园纪念文库”，“昭和 26.9.10 受人阪大 32860 图”诸印记。此十二篇，曾於《艺文》杂志第十一卷 6—9 期发表，收入《硕园先生遗集》第五册（昭和十一年怀德堂纪念会刊），竹治贞夫《楚辞研究》第五章《楚辞的日本刻本及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1978 年风见书房印行）有详细论述，精到要括，笔者不再展开论评。第二册为下卷，首目次：名字，放流，自沉，生平[卒]，扬灵，骚传，宋玉，拟骚，骚学，注家，计十篇。卷端“屈原赋说下卷 大隅西村时彦初藁”，钤“怀德堂图书记”，“大阪大学图书”，“硕园纪念文库”，“昭和 26.9.10 受人阪大 32861 图”诸印记。下面逐篇介绍其论旨：

[名字第一]西村认为：“司马迁父子相继成《史记》，而定原为字，定平为名。刘向校秘书，博览多识，不减于司马氏，而亦从《史记》而不疑，可以知其必有据矣。”宋绍兴三十一年建阳陈八郎崇化书坊刊《文选》卷十六“离骚经一首 屈平”，张铣注：“《史记》云，屈原字平，仕楚为三闾大夫。”後世学者，好异标奇，盖本于此。西村断言：“《史记》‘虽多异本，无书‘字平’者，则知张注‘字平’是‘名平’之误。否则臆改《史记》，牵附口例也。”

[放流第二]西村叹云：“屈子其如神龙乎？其尾见贾谊《吊文》，而其首古书不一及。《史记》掇拾传闻，以描首尾，其文夭娇变幻，不可端倪，犹片甲残鳞隐现於云间。是以群疑百出，无一定说。善读书者，与屈子之文互相参稽，则用舍死生，大略可以仿佛耳。”西村的具体结论是：怀王之世，屈原被疏，绌（或言自疏，自退），罢左徒，犹不失为同姓大夫，“而《史记》书‘虽放流’者何也？以虽疏绌非放流，而其迹犹放流也。”（按：《史记》“虽放流，眷顾楚国”一段，实刘安《离骚传》中语窜入者，西村未能识破）“《史记·屈原传》以《离骚》为骨子，故先叙屈子所以作《离骚》，而其初疏在何年，不可知也。後叙其繫心怀王，以明作《离骚》在怀王入秦之後也。”又谓“因谏‘不如无行’，王不听而入秦被囚，於是作《离骚》。”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曾国藩云：“闻屈原作《离骚》。”西村谓：“此说得之矣。《离骚》迫切，乃又作《远游》以申远逝自疏之意。”

[自沉第三]屈子之死，宋以前未有疑其自沉者。至南宋林应辰始有屈子不沉汨罗之说，著《龙冈楚辞》五卷。明汪瑗剿袭其说，作《屈原投水辨》，不通训故，不知文理，安得破西汉诸儒所传之旧说哉！

[生平第四]（略）

[扬灵第五]汇集跟屈原传说有关之地理古迹，民俗

故事，“我国每至五月五日，亦作粽，浴菖蒲汤者，盖屈子之遗风。”称颂屈原“离愍于一时，扬灵于百世。愚读其书而思其人，未尝不睠睠于明月之被，宝璐之佩也。故集录古传以备参考如此。”

[骚传第六]楚辞之传，其故有二：其一高祖乐楚声，楚声存於楚辞，於是屈原诸赋，得掇拾而流传焉。其二楚辞之传，楚元王刘交（刘邦少弟）之力也。“矧方高祖乐楚声之日，封屈子吟泽畔之国，昭，屈，景三姓尚未迁徙，而左右有穆（生），白（生），申（公），韦（孟）诸儒，访流风於坠简，求馀韵於残篇，遍搜而广采，珍重而传诵，是虽（无）记载可证，而愚依情与理而推断之，知其不太谬矣。其孙辟疆，曾孙德，并承家学，至元孙刘向，典校秘书，哀辑《楚辞》，分为十六卷。盖《鲁诗》与《楚辞》并为元王所传家学，绵延至向有斯编，而其子歆作《七略》，录屈原所作，盖仍向《别录》，《汉志》所谓屈原赋二十五篇，尚沿向，歆之旧，则所谓二十五篇，亦焉知无非元王与诸儒论定耶？”《楚辞》成书之过程，向无定说，西村氏之考论，可备一说也。

[宋玉第七]屈子作《招魂》以祭怀王；後屈子自沉，宋玉亦作《招魂》。屈作称“大招魂”，後人省魂字曰《大招》；宋玉所作称“小招魂”，後人省小字曰《招魂》，二招皆为死者作。“以旨而言，则《大招》醇古，如朱子说；以辞而言，则汪洋恢诡不可端倪为古辞赋中第一奇文，玉之富於辞采，殆过於其师。”《九辩》亦宋玉所作，其成于原迁江南之日。

[拟骚第八]拟骚之文，大抵皆为代言之体，《九辩》，《招魂》实作之俑矣。《惜誓》之义，惜屈子之誓死而不知变计也。《招隐士》“文气似《九歌》，汉以来拟骚之文，学者皆以此篇为第一矣。”庄忌《哀时命》通篇多排偶之语，前联下句与後联上句相对，盖为一种创格，以启六朝骈骊之体，祇憾其气魄不足耳。《谏》，《叹》二篇规摹《九章》，《怀》，《思》二篇体制《九歌》，自朱子有“无病呻吟”语，元，明以後人并不好读拟骚诸篇。“予耽读楚辞，群疑百出，因取《楚辞》十七卷，精读毕业，而後知拟骚诸篇之必不可不一读也。何以言之？以拟骚诸作是二十五篇注脚也。汉人读骚之法，存于拟骚诸作之中，屈子事迹，往往有可徵者。其辞气虽平缓，而其造法之炼，结撰之工，亦皆可以为法，後世文章，渊源於此，不可不知也。”西村此论，盖经验之谈，楚辞学人，应予重视云。

[骚学]，[注家]二篇并缺。

《屈原赋说》上卷十二篇，下卷八篇（初稿），计

二十篇。西村有诗云：“读骚成癖萃群言，閒与诸生费讨论。《赋说》廿篇稿未就，迅风迫日欲黄昏。”下卷系初稿，又缺两篇，诚为可惜。然就已完成的二十篇而论，我们赞同竹治贞夫先生的论断：《屈原赋说》“作为楚辞概说，其考证的精密和规模的宏大，至今尚未见出其右者。”（《楚辞研究·楚辞的日本刻本及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1978年风见书房印行）

(4)《楚辞集释》不分卷。1899年，西村在上海购得《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重刊汲古阁本。此印本系大开本，天头，地脚，左右栏外，纸幅极宽大，西村《集释》，即书於其间。卷端题“楚辞集释 西村时彦手藁”，钤“时彦”（阴文），“子俊”（阳文）印记。内容包括“集释”，“存异”，“私案”，音义（字句校勘，韵字），句点（王，洪注）等五部分。“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二句，“集释”（白文朱印）下引《尔雅》，《曲礼》，五臣注，朱熹，周拱辰，方望溪，李光地，钱饮光，戴震，胡文英诸家解说，“存异”（白文朱印）下录王闿运《楚辞释》：“皇考，楚祖庙之名，即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若以皇考为父，属辞之例，不得称父字，且於文无施也。”“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二句，“集释”引朱子，陈氏（本礼），钱杲之，林西仲，徐友云（焕龙），李光地，钱饮光，胡文英，张松南（德纯），江中时，戴震等十一家之说，“存异”录屈复《新注》，“私案”（亦白文朱印）下云：“初度之解人人殊，今从陈说。後世八字本于此。”“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二句，“集释”引朱子，钱杲之，林西仲，张松南，钱澄之五家，“私案”曰：“内美，修能，从质性说到学问。内美，尊德性也；修能，道问学也。纷吾一解，专言修也。”又曰：“纷吾，汨予，皆倒置法，屈子独创，犹言‘吾既有此内美之纷兮’也。”大略言之，“集释”，“存异”致力于《楚辞》注释文献的收集，条理，类化，“私案”则是著者的见解，或赞同，或证成某家之说，或批评，或扬弃前说，自出机杼以创为新说。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淹，久也。”西村“私案”曰：“《尔雅·释诂》：‘淹，留久也。’扬子《方言》云：‘淹，败也。水敞为淹。’钱氏《集传》云：‘淹，水不流也。以水留久也，不流故敞也。’王注云：‘淹，久也’，可知脱‘留’字。《集注》袭王注亦作‘淹，久也’，字义不明。”又批评说：“林云‘惟，思也’，非也。时文习气耳。”“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二句，西村“私案”云：“王注前说为佳。一说，非也。服，

行也。《书·说命》‘旨哉，说乃言惟服。’传云：‘美其所言，皆可服行。’又《管子·权修篇》‘上身服以先之’，注云：‘服，行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寤朝谇而夕替。”西村“私案”曰：“悲不能救民生多艰。王注引‘申生’，‘子胥’，非也。又以鞿羈‘为人所系累’，不如《集注》（言自绳束而不放纵）义长也。从王注，则‘以’字作‘而’字看，‘寤朝谇’，与‘寤寤之为患’及‘寤吾’相应，皆内美，修能之所致也。”“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揽芷。”西村“私案”：“君之替余以蕙纁之故也，又自申以揽芷而不悔也。王注言替後又申以揽芷。朱子云：‘此言君之废我，以蕙芷为赐而遣之，似待放之臣，予之以玦然後去也。然二物芬芳，乃余心之所善，幸而得之，则虽九死而不悔，况但废替而已乎？’此说尤非也。见此等之说，似《集注》非朱子所作！”“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二句，王逸注：“周，合也。”西村“私案”曰：“周容之周，不必训合。为周遍之周，亦通。周容，八面求圆之谓也。”《离骚》全篇，西村以韵分章，以便诵读，“从陈氏（按指陈第《屈宋古音义》）而除‘黄昏’二句，则八句一韵五章，十二句一韵二章，四句一韵七十七章，共三百七十二句也。”各章，句大多有西村“私案”。自楚辞学发展史观之，是书之“私案”，尤为值得注意，因为它具有学术发展，学术创新之意义，亦西村一生心血之所凝聚。卷末有跋云：“此书二十年前於沪购获之，尝一再读过。今年病间，又把而读之，遂加句点。东方，严，王以下，所谓‘无病呻吟’者，予乃於卧病呻吟中，且读且点，不知病之身也。大正八年五月念日硕园主人识。”钤“天囚”（阴文）印记。此只言“句点”，未提及“集释”。考《九歌》卷末有题识云：“大正六年丁巳八月，且读且注，时浴于马山泉场，有句云‘人问今年消夏记，注骚一卷在名山’，纪实也。硕园彦识。”钤“硕园”（阳文）印记。盖西村之《楚辞集释》，完成《离骚》，《九歌》两卷，《天问》以下，集中於题解，文内“集释”尚少，殆未完之稿。大正九年五月（1920），西村於《屈原赋说》上卷题识称“愚因著论，略述大旨。刊误补义，待诸他日焉。”大约这时期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好了，“乃於卧病呻吟中，且读且点，不知病之身也”。像西村时彦先生这样，沉湎于楚辞研究，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前辈，应该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纪念！（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怀德堂中心汤浅邦弘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崔富章（1941年—）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图书馆副馆长，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等历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古典文献学研究工作。

石川三佐男（1945年—）男，文学博士，秋田大学教授。中国出土资料学会理事，全国汉文学教育学会评议员，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员，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抄录）

—兼述中国人心目中的屈原形象—

中国]浙江大学 崔 富章

日本]秋田大学 石川三佐男

本研究は平成14年度秋田大学教育改善推進費の助成を得て行った合作研究「日本亞洲文化研究」の成果である。本論考を成すに当っては大阪大学懷德堂センターにおける西村時彦蒐集の「楚辞百種」の調査，それを踏まえての崔による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における學術講演，崔と石川の意見交換等が基本になっている。

本論考の主な内容は，一，民俗祭礼に見える屈原の故事。二，士人の心のなかの屈原のイメージ。三，西村時彦の楚辞学に関する貢獻，から成っている。三の項目はさらに次のように細分される。すなわち，西村時彦の蒐集した「楚辞百種」のテキストは善本が二十余种に及び，その数量と質は他に並ぶものがないほどである。また西村の楚辞学に関する研究の成果は四種の專著（「楚辞王注考異」一卷，「楚辞纂說」四卷，「屈原賦說」二卷，「楚辞集釈」不分卷）にまとめられており，その考証は精密を極め，規模は絶大である。以上から西村の楚辞学は広く人々の称賛に値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指摘できる。

キーワード：西村時彦 楚辞学 楚辞 屈原 端午節 楚辞王注考異 楚辞纂說 屈原賦說 楚辞集釈 懷德堂センター 楚辞百種

(Received January 22, 2003)